

【专题论文】

在黑暗里传中文教育薪火：

以钱穆、林语堂和沈慕羽为例

**Passing on the torch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Dark
Case studies on Ch'ien Mu, Lin Yutang, and Shen Muyu**

须文蔚*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Shiu Wen-we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E-mail: winwayxu@ntnu.edu.tw

Published online: 19 December 2020

To cite this article (APA): Shiu,W.-wei. (2020). 在黑暗里传中文教育薪火：以钱穆、林语堂和沈慕羽为例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 1(2), 60-76.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1.2.2.2020>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1.2.2.2020>

摘要

本文旨在回顾香港、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中文教育历史，讲述世变下知识分子传递中文教育薪火曲折与艰辛。藉由钱穆、林语堂与沈慕羽在 1949 年之后推动中文教育的故事，铺陈出离散处境下，知识分子如何将中文与人文精神，灌注在异乡教育体系中，又如何试图实践他们的生命关怀，并在风雨如晦的时代，传递中文的薪火。钱穆在英国殖民地上，建构书院，面对中国大陆当时弃传统于不顾，他尽一己心力，挽狂澜于既倒的用心，实在不应仅当作一则贫困中的传奇，更值得细心考察他对文学、人文与通识教育的重视。在钱穆与林语堂的挫败中，更不

*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教授

难体察到，在殖民地与异国的政治文化下，华裔离散经验的凶险与混沌，意识型态国家机器总是会以各式的动员方式，将文化与思想单一化，中文作为一种特色与反抗的力量，除非有足够坚强的社会力量，有识之士能够团结，不停歇抗争，确实不易薪火相传。沈慕羽更展现出晦暗风雨中的一丝光芒，本于基本权力保障的意识，长期抗争，团结教育界、商界与小区力道，使得马来西亚成为两岸三地外，华文教育体系保留最完整的国家。显见中文的薪火传承向来不是水到渠成的，而是必须透过知识分子与教育环境、政治文化与知识力量激烈辩难，投注自身的信仰、理念与坚持，方才能够点燃文学的火花。

关键词： 中文教育、钱穆、林语堂、沈慕羽、华语语系文学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review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nd state the tortuous and difficult processes that intellectuals had to go through to pass on the torch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a changing world. Based on Ch'ien Mu, Lin Yutang, and Shen Muyu's stories for promoting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fter 1949, this paper states how intellectuals implemented Chinese language and humanistic spirit into the education systems in foreign lands, as well as how they put into practice their care for lives and passed on the torch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h'ien Mu established an academic institution in the British colony. He had to face the fact that mainland China abandoned the tradition at the time and he put all his efforts into saving the critical situation, which should not only be regarded as a legend in a poverty situation, but we shall also carefully study how he valued the importance of literature, humanity and general education. It is not difficult to realize from the frustration of Ch'ien Mu and Lin Yutang that the risk and chaos of Chinese descent had been encountered under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colonization and foreign countries. The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always utilizes a variety of mobilization methods to integrate culture and ideas for homogeneity. With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resistance force, the torch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indeed not easy to be passed on, unless the intellectuals were able to be united to fight ceaselessly with sufficient forces from the society. Moreover, Shen Muyu represented a glimmer of light on a dark rainy night. Based on the awareness of protecting fundamental rights, Shen combined the strength from the education industry, business industry, and communities to conduct a long-term fight to empower

Malaysia to become the country with the most comprehensiv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system outside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It is obvious that passing on the torch of Chinese Language is not a matter of course, but instead, the spark of literature can only be ignited through the processes of the fierce argument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education environment, political culture and intellectual power, along with their dedicated beliefs, ideas, and persistence.

Keywords: Chinese education, Ch'ien Mu, Lin Yutang, Shen Muyu, Sinophone literature

一、前言

近年来华语语系文学研究风起云涌，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以中国大陆以外，华语作为母语各区域，包括台湾、香港、东南亚、美加与欧洲等地的华文文学¹。王德威就提出“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的观念，相对于以往的海外文学、华侨文学，往往被视为祖国文学的延伸或附庸，如能进一步从跨区域文学传播的角度分析，将能彰显当代华文文学思潮的发展与传播，并不是在一个封闭的架构下，而是整体华文世界的作家交互激荡，进而建构出当代多元缤纷的文学现象²。面对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区域文化、政治结构，华语语系文学理论建构下，文学研究圈开始瞩目各国离散处境下的文学创作，但触及中文教育的讨论始终不足。

回顾中文在面对移民社会认同的变化，逐步受到忽视。犹有更复杂的是，在各国打压华人及中国文化，华人还要面对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意识型态之争，移民与遗民身份的转换，世变下的知识分子传递中文教育薪火，往往更显得曲折与艰辛³。唐君毅以“花果飘零，灵根自植”，道尽了在教育岗位上，传承中文经典工作者，共同的愿望、沧桑与坚持，绝对能够启发散居世界各地的中文教师。

本文透过三个在华人社会推动中文的教育家：钱穆、林语堂与沈慕羽，在1949年之后，他们分别于香港、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推动中文教育的故事，初步铺陈出三个华人离散处境下，知识分子如何将中文与人文精神，灌注在异乡教育体系中，又如何试图实践他们的生命关怀，并在风雨如晦的时代，传递中文的薪火。

二、1949 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的人文主义光辉

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易手，一批知识分子南渡香港，张其昀、钱穆、唐君

¹张错，〈文学奖的争议与执行：世界华文文学领域探讨与展望〉，《文讯》222期（2004年4月），页4。Shih, Shu-mei. “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 *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volume 119, Issue 1 (January, 2004), p.29.

²王德威，〈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联合报》E7版，2006年7月8-9日

³黄锦树就强调：“华文华语一如华人，都是典型的‘现代发明’。可以说是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衍生物。海外维新运动及国民革命需要召唤、构筑民族共同体，那就必须超越方言群认同，那新的历史主体就是华人；而相应的黏合剂则是华语（它是民族国家国语的对等物）。”充分说明了海外华文教育有着复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逻辑。参见黄锦树，〈制作华文，想象华人：马来西亚独中华文中学初中华文课本三种版本分析〉，收录于《2009年亚太地区语言与文化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屏东：国立屏东教育大学，2010年6月）。

毅、张丕介等学者民间兴学，最早名为亚洲文商学院（即亚洲文商专科夜校），随后于1950年3月改组并易名为“新亚书院”。其教育宗旨在于“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

从学院名称考究，“新亚”亦即“新亚洲”，也可指亚洲的新生。依唐君毅先生的阐释，在概念上，亚洲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因此，新亚精神正是一种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为本位，同时照顾世界文化思想发展的最新潮流的一种中西文化结合的文化精神，自有其恢弘的视野。⁴另一方面，书院强调以中国宋明时代的传统“书院”方式授学，这种授学方式符合密切师生关系，以便引导学生于道德与学问上的追求，同时藉此令学生视“发扬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精神与和平思想为己任”，明白“循此正规以达救己救世之目标”⁵。因此，在新亚书院导入了人文教育、通识教育，有科系的专业，也有导师制度，照钱穆的说法：“中国宋代的书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现代的大学教育是课程中心的。我们书院的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的。”⁶也实现了他认为学术本无界划，智识贵能会通的理念⁷。

在钱穆的心目中，大学分科与强调专业的状况，往往使得学生过度专注细节，忽略的人文整体的关怀。他就曾严厉批判他熟悉的文学院教育，批评专业化使大学培养不出合格的中学国文教师。他描述大学国文系的情形：

国难以前，国内最负时誉之大学，莫不竞务于院系之析置，教授之罗聘，以及课程之繁列。一学系教授往往至七八人，课目往往至一二十门。而此等课目，则皆此等教授之专门绝业。二十左右之青年，初入大学，茫无准则，于选科之外，又继之以选课。治文学者，或治甲骨钟鼎，或治音韵小学，或治传奇戏剧，或治文艺创作，亦复各筑垣墙，自为疆域。其于文学之大体，则茫然也。其他治历史哲学以往者，亦复尔尔。……今日一大学

⁴唐君毅，〈我所了解之新亚洲精神〉，《中国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台北：学生书局，1988）。

⁵周爱灵著、罗美娴译，《花果飘零——冷战时期殖民地的新亚书院》（香港：商务印书馆，2010），页30。

⁶钱穆，〈新亚学规〉，《新亚遗箴》（北京：三联书店，2004），页42。

⁷钱穆主张，“夫学术本无界划，智识贵能会通。今使二十左右之青年，初入大学，茫无准则，先从事各人之选科。若者习文学，若者习历史，若者习哲学，若者习政治、经济、教育。各筑垣墙，自为疆域。学者不察，以谓治文学者可以不修历史；治历史者可以不知哲学；治哲学者可以不问政治。如此以往，在彼自以为专门之绝业，而在世则实增一不通之愚人。而国家社会各色各门中坚领袖人物，则仍当于曾受大学教育之学者中求之。生心害事，以各不相通之人物，而相互从事于国家社会共通之事业，几乎而不见其日趋于矛盾冲突，分崩离析，而永无相与以有成之日。”见钱穆，〈改革大学制度议〉，页196-197。

国文系毕业之学生，即深感不能担负中学国文教员之重任。……中学国文课所需者，乃一略通本国文字文学大义之人才，而今日大学教育，即绝不注意及此。⁸

因此他在新亚书院想实验的教育中，中文学门应当先注重培养“略通本国文字文学大义”的人才，不需要急着打造学术领域的专家，也就是以人文学科为一切学问的本源，藉此认识知识的真价值与真知识，同时以“通学”取代专业⁹。

1950年，新亚书院得商人王岳峰先生资助，迁入九龙深水埗桂林街校舍。1953年秋，创办新亚研究所。1954年，新亚书院获美国雅礼协会拨款资助，校舍于1956年迁入九龙土瓜湾农圃道。钱穆为了鼓舞学生，特别撰写了校歌，其写实地展现了创校时期的窘迫：“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 十万里上下四方，俯仰锦绣，五千载今来古往，一片光明。五万万神明子孙。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 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新亚精神”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象征，据钱穆描述，新亚书院草创初期，经济极为拮据，设备简陋，规模狭小，但仍然凭借如此可怜的物质条件，致力表现出学者的教育文化理想，就是新亚的精神。同时，当时新亚学生多历颠沛流离，亦多为穷困所迫，但仍有志上进，努力进学，亦是新亚精神的体现¹⁰。而最重要的新亚精神展现，莫过于强调人文主义为办学宗旨，藉此打通东西文化，沟通为学与为人、通才与专才、知识技能与人格理想¹¹。

雷震在其回忆录中直言，五十年代初“据派驻香港的特务密报，香港时报

⁸钱穆，〈改革大学制度议〉，页197。

⁹钱穆认为，近代新教育开始。那时如张之洞、梁启超一辈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但那时又那里有所谓中学呢？科举八股可勿论，即就乾嘉经学说，也够不上为中学建体。那时经学已走上末路，支离破碎，远不是乾嘉之旧规模。那时的中国，正已学绝道丧，奄奄一息。国家文教精神扫地无余，士风极度败坏，政治社会各部门各方面，无领导，无支撑。正如一只无舵之船，随风飘荡，又值惊涛骇浪，相袭而来，颠覆沉没，随时可遇。见钱穆，〈理想的大学教育〉，页220。

¹⁰钱穆（1954），〈新亚精神〉，《新亚校刊》第四期，1954年2月25日。刘再复的评论最为深情：“在本世纪中国，钱穆先生是研究实迹最为丰厚的卓越史学大师，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共约一千四百万字。在我心目中，他一直是一个孔子似的巨儒形象：论语滔滔，长须拂拂。没想到他却能写出这种溢满青春气息的歌词。而且，这歌词正是钱穆精神的象征：对古往今来五千载的故国历史充满‘温情与敬意’，对宇宙万物中最宝贵的人和他们的生命充满尊敬与爱意，对注定是艰辛与艰险的人生道路和学术道路充满信心与信念。”刘再复，〈新亚校歌：珍重珍重〉，《明报》（1997年7月2日）。

¹¹王王颖，〈论书院精神的现代传承——兼谈新亚书院的办学启示〉，《合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4卷，第五期（2007），页215。

每日只发行二百份，蒋中正拍桌勃然大怒，我就奉命去香港查明真相……”于是在1950年底、1951年初，两度派雷震赴港考察。蒋中正于1950年10月，派时任“香港时报管理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雷震赴港调查《香港时报》发行数字，该报是否可能自主营运，以及该报出版后在香港的影响¹²。雷震返台后，在1950年39年11月2日“呈总统蒋中正报告”中除了明确建议报纸应正常发行，并观察了第三势力的发展，以及香港中文教育的发展。他建议：“港澳有大学数所，教育立场上是反共的，在经费方面是坚苦撑持，如钱穆等来港创办之新亚书院。吴康主持之由广州迁港之文化学院，此外另有大学二所。中学如吴铸人主持之辅人书院，澳门有大学四所。教育部应经常与之取得联系，并给予经费补助，和其它便利及慰安。而钱穆先生主持之新亚书院，尤应立即补助，以免停办。”其后蒋介石不但亲自邀请钱穆来台一叙，由宋美龄、蒋经国招待，同时指示教育部当局每月拨给钱穆港币3000元，供新亚书院度过资金困境，前后长达四年。直到两个美国非政府组织（雅礼协会及福特基金会）经当时的香港教育署长卢定推荐下，辗转接触到新亚书院并提供资金的援助，新亚书院的经费才更为稳定¹³。

1957年，出于殖民地教育政策的考虑，港英政府倡议，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组成中文专上学生协会，为香港成立第二所大学作准备。事实上，港英政府当局先以联合制诱使三书院合并，预埋后来实行实际的统一制的伏笔¹⁴。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正式成立。当时各成员书院之教学及行政均为独立，大学中央仅负责统筹与全校有关的行政事宜。此际，钱穆显然倍感焦虑，特为文强调“中文”的重要：“每一个民族，各有他们特殊的语言文字，各有他们特殊的文学艺术之爱好，各有他们的宗教信仰、与夫哲学观点，各有他们的思想方法，各有他们的历史传统、人生习惯，与夫政治社会种种不同的现实情况。一所理想的大学，正贵在此方面具备他的深厚的特殊性。”¹⁵他期望一旦这样的大学出现，以中国语文、中国历史文化为教授对象，必定能对“符合世界理想的一种人文教育”做出特殊贡献。这一点在当时还是殖民地的香港来说，可以说是相当独特的主张，也不免与整个依照西方大学传统设立的“香港中文大学”其它学科多所扞格¹⁶。

¹²雷震，《雷震日记》（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89），页193。

¹³周爱灵著、罗美娴译，《花果飘零——冷战时期殖民地的新亚书院》，页79。

¹⁴刘桂标，〈新亚精神的意义和价值——为纪念新亚书院创校五十周年而作〉，“香港人文哲学会网页”，<http://www.arts.cuhk.edu.hk/~hkshp>，1999年10月。查阅时间：2016.10.01。

¹⁵钱穆，〈一所理想的中文大学〉，收入氏著，《文化与教育》，《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1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页244。

¹⁶陈以爱，〈钱穆论人文主义教育的失落与重建〉，《国史馆馆刊》，第45期（2015），页192-193

钱穆的论说不久也成为一种绝响，陈国球就直指，这种过度强调“中文”的重要性，其抗衡的对象就是作为殖民统治象征的英文，这也正是香港大学的教学语言¹⁷。1973年，新亚书院迁入沙田区香港中文大学校园，新亚教育文化会则在农圃道旧校舍开办新亚中学。1976年，香港政府建议中大改制，将学科教学的工作统一归由大学中央办理，书院仅负责学生福利及通识教育等工作。新亚书院校董会九位董事，包括唐君毅、李祖法、钱穆、沈亦珍、吴俊升、徐季良、刘汉栋、任国荣、郭正达，以此违反中文大学之“联邦制”本意为由，集体辞职抗议，钱穆所规划的人文主义与中文特色教育系统，也就淹没在西学与专业为潮流的殖民地教育体系中。回顾新亚书院的历史，周爱灵特别强调，由钱穆为首建立的新亚书院适时保护了华人青年的精神与思维，无论课程或身教，教师们秉持的传统思想，独立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之外，使青年可以在乱世中卓然独立思考，此一重要的教育理念，是香港乃至中文教育史上，绝对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¹⁸。

三、1954 林语堂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办学的挫败

相较于钱穆与唐君毅在香港困顿办学，林语堂有机会在1954年到新加坡，办理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大学，他说：

一九五三年年初，新加坡的侨领们聚在一起，筹组南洋大学（中国人通称东南亚为南洋）。英国最初对于创办南洋大学的计划加以反对，诚恐已为共党在马来亚反抗运动中所利用的华侨与马来亚人之间的种族裂痕会更趋严重，但在华侨的坚持之下，英国人乃让步而改取不过问政策。一九五三年五月，南洋大学正式成立，最高机构是一个九个人的理事会，亦称为董事，是由马来亚联邦九省、沙撈越及新加坡的殷富侨商的委员会所控制，其中以六十人组成的新加坡委员会为最重要，事实上亦掌握着校务。一九五四年正月一位使者来到我的纽约寓邸（我当时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请我出任校长。¹⁹

¹⁷陈国球，〈文学教育与文学经典的传递——国现代文学在香港初中课程的承纳初析〉，《现代中文文学学报》，第6卷2期&7卷1期（2005/06/01），页104。

¹⁸周爱灵著、罗美娴译，《花果飘零——冷战时期殖民地的新亚书院》，页2-5。

¹⁹林语堂，〈共匪怎样毁了南洋大学〉，网络资料（<http://tw.aboluowang.com/2009/0628/135429.html>），2009年6月28日。此文是林语堂离开新加坡后，在1955年5月2日在《生活杂志》发表的文章，中文由中央社翻译。文中充满情绪，指陈离开南大是北京下令逼他走的“政治事件”，指陈六使“天真无知”、“不识之无”，李光

接获这个意外的转机，林在一九五四年十月举家欣然赴任。

林语堂曾获上海圣约翰大学学士学位、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是一位以英文书写而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也是集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学家、旅游家、发明家于一身的知名学者。林语堂因为翻译“幽默”（Humor）一词，以及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本杂志，提倡幽默文学，“幽默大师”自此加冕，影响当代散文文风甚巨。他用英文书写《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风声鹤唳》、《朱门》、《老子的智慧》、《苏东坡传》等经典名著，向西方介绍东方文化，破除当时外国人对中国之成见，进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作为一位语言学家与发明家，他根据自己研究出的“上下形检字法”，几乎倾家荡产，发明简便使用的中文打字机。可惜此一打字机并未量产。但一九七六年林语堂在台湾向内政部申请并获得“上下形检字法”专利，一九八五年林太乙和妹妹将专利授权神通计算机，由神通计算机发展为现代中文计算机常用的“简易输入法”，现在改称为“速成输入法”。

在一九四〇年代，林语堂已经是名满西方的散文与小说家。王德威就指出，撇开私人因素不谈，林语堂的决定有其使命感。就像在香港的唐君毅一样，他何尝不是有国难归，只能长兴“花果飘零，灵根自植”的感慨？然而只要稍作观察，则可知两人兴学的经历和结局何其不同。唐君毅、钱穆等以宋明书院作为模式建立新亚。他们有志一同，以传承儒家道统为己任，而且“直下承担”种种挑战²⁰。在时代意义上，林语堂接下此一教育工作，很重要的背景是：“中国侨居海外的华侨们在其他亚洲民族之间的处境，常是十分困难，他们辛勤工作，常能积聚财富获得权利，但也因此导致仇恨和迫害，更重要的，他们都有着几种不同的忠诚，其中以忠于祖国的忠诚最高。数十年来，他们一向将子女送往中国受教育，然后在他们迁至侨居地时可以保住中国的语言和文化。”²¹但中共建立政权后，大量吸收南洋的侨生，施以思想训练，造成了世代的冲突与不安。如能在新加坡办理一个保有中国文化的大学，不啻是一个“遏止共党在东南亚的渗透”的良方。

打动林语堂起身接受他向来厌恶的行政工作，是陈六使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写的一封信，其中提及：“吾人如不于今日设法保留吾国之文化，则十年之后，吾人行将见此间同胞之教育必将岌岌可危，二十年或三十年后，吾人之语言文字或

前“偷偷摸摸”，陈嘉庚在“幕后指使”，南大成了共产党的工具，众多华校被共产党渗透。此文一出引发诸多争议，也让侨界颇为愤慨。

²⁰王德威，〈历史，记忆，与大学之道：四则薪传者的故事〉，《台大中文学报》，第26期（2007），页27。

²¹林语堂，〈共匪怎样毁了南洋大学〉，网络资料（<http://tw.aboluowang.com/2009/0628/135429.html>），2009年6月28日。

并将消失无存，四十年或五十年内，吾等将不复为中国人矣。”这让与陈六使等在地侨商并无渊源的林语堂，在对新马一带的政治文化全无了解的情况下，贸然喊出学生“必学贯中外”、“所学必有所用”的宗旨，而且还要向哈佛、莱比锡看齐，办第一流大学，他的壮志固然可敬，但却低估了现实压力²²。

林太乙在《林语堂传》第二十章“南洋大学校长”中，以十二页的篇幅说明了林语堂受聘出任南洋大学校长的始末经过。林语堂偕同夫人、林太乙与黎明于一九五四年十月二日到任，却于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六日辞职。林太乙认为当初南洋大学因林语堂“举世闻名”而特聘林语堂担任校长，却在各方面无法满足林语堂提出的要求，并且在创校过程时有纷争。

林语堂任用二女儿林太乙为校长秘书，女婿黎明为相当副校长职权的行政秘书；他并要求成立建校基金保管委员会，全权处理高达七百万美金的预筹款款项，引发了诸多争议。放大眼光，林语堂的要求有其脉络可循。一九二六年他出任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也曾雄心勃勃，从北京请来鲁迅、沈兼士等人共襄盛举。未料因为没有实权，最后不仅鲁迅等被逼得走路，他自己也挂冠求去。多年后林出掌南大，自然有了未雨绸缪的准备，不料过犹不及，以致再度失败²³。林太乙形容，开会时“大家都发表了尖酸刻薄的说辞”、“南大事件的最后一幕是典型的，也是笨拙的共产党手法。”根据林语堂自己的描述：“有几个董事评击我的纽约来信中署年为‘中华民国四十三年’。同时因为我国报纸的登载，说我曾经说来新加坡是要建立一个‘反共’大学，而使我受到严厉的批评，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我当时是说要建立一个自由大学，一个人们能够自己思索，对政治问题自由决定其主张的大学。”同时小报也攻击林语堂办校的风格，甚至为他贴上美国特务的标签。最后，甚至有学生以奇特的抗议手法，陷校长于不义²⁴。林太乙在南洋大学的风波结束后说：父亲并没有因为南洋大学不愉快的经过而感到气馁。他年纪越大，对社会上的诈欺、虚伪看得越淡漠²⁵。

一九五五年春天林辞去南大校长职位后，隐居法国戛纳韬光养晦。这年他推出了科幻小说《奇岛》(Looking Beyond)，另一译名为《远景》。《奇岛》虚构了

²²张曦娜，〈南洋大学创办的内情〉，李业霖主编，《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马来西亚：南洋大学校友会出版，2002)，页41-46。

²³有关林语堂与南大恩怨的负面批评不少，详见陈怡苹，〈林语堂与南洋大学〉“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2008年11月7日(<http://www.nandazhan.com/lishi/yutang06.htm>)

²⁴详情为：“当此项反对补助的运动正在进行之际，有一批学生曾经向我作过一次古怪的访问，一天晚上，十点半钟，一批男女孩子来我家里见到我的女儿，他们说有一封关于补助问题的信要给林校长，我女儿问他们的姓名，却无一人肯说，信后亦未署名，我当时已经就寝，第二天早上这封信即已登载报上，并且说是‘林校长拒见代表团’。”见林语堂，〈共匪怎样毁了南洋大学〉。

²⁵林太乙，《林语堂传》(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

一个21世纪初期的乌托邦故事，故事发生的时间是2004年，世界发生了核武战争，人口锐减，现有的国家毁灭，故事的女主角芭芭拉和未婚夫保罗无意发现与世隔绝的南太平洋小岛“泰诺斯”，岛上的人们热切地欢迎他们。小说塑造了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乌托邦乐土。这座梦幻中的城邦由来自欧洲的移民们建设，保存古希腊文明，并与当地的原住民族相处得很友好。在泰诺斯，岛民适度压抑科技文明，充分尊重个人自由，政府的干预降至最低程度。随着主人公对小岛的适应过程的延续发展，一幅动人的乌托邦美景也徐徐展现在读者的眼前。这里没有战乱，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利益矛盾，没有冤冤相报，只有单纯、诚实、纯粹的宗教和幸福的精神享受。《奇岛》展现了林语堂的理想社会的缩影——古希腊的田园风味和中国老庄的“无为而治”的精神。

王德威指出，在饱受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打压后，林语堂来到新加坡，岂不正是要找寻他自己的“奇岛”？他希望把南大建立一个知识和情性的乌托邦，开展理想的中文教育，一个摆脱历史纷扰的理想国。然而南大的一场风暴证明海外的教育有着复杂的政治、文化与经济的压力，新加坡显然不是林语堂心目中的“奇岛”²⁶。在林语堂离开后，这所中文大学随即卷入了英国与新马在地力量的争夺，随着陈六使认同新中国，陈嘉庚更于一九四八年即任中共政协常务委员，让新建立政权的李光耀有机会将南大贴上“共党”的标签，逮捕打压南大的毕业生，甚至在1980年以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方式遭到关闭²⁷。中文教育的理想，在以华人为主建构的新兴国家中，依旧不敌后殖民框架下的英语，无法成为主流的文学与语文教学系统。

四、1965 沈慕羽在马来西亚：掌理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相较于大思想家钱穆与幽默大师林语堂，在马来西亚推动中文教育的沈慕羽，或是林连玉，都缺乏跨国的知名度，然而他们为马华社群打造中文教育的基石，创造绵延数个世代的教育体系，诚为一个教育文化上的奇迹。他们善用法国社会学家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所说的“日常生活中的反抗”，竭尽所能使用权宜之计，在现存文化中存活，特别是沈慕羽的反抗往往不等同于对立，却能

²⁶王德威，〈历史，记忆，与大学之道：四则薪传者的故事〉，《台大中文学报》，第26期（2007），页28。

²⁷太史公孙，〈南洋大学历史钩沉：关闭南洋大学究竟是谁的主意？〉，“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2013年4月30日。（<http://www.nandazhan.com/lishi/shuiguan.htm>）

够将主控的能量加以阻碍消除，透过挪用与重新使用，与原本的文化“生存在一起” (make with)，不但在不同时代，表现出不同的创造力，还能将手边受限的资源重新做创造性的拼凑(bricolage)，来宣示自身的能动性，使马来西亚的华人得以拥有难得文字居所。

沈慕羽先生（1913年7月20日—2009年2月5日）是马来西亚华裔教育家、华教工作者及书法家。他出生于马六甲，曾担任林连玉基金主席、马六甲中华大会堂主席，也曾担任马六甲平民学校校长27年，更重要的是功绩，是从1965年开始，他担任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简称教总）会长长达29年。现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能够保存1283间华小，60间独中，更积极争取设立大学与学院，实则经过与英国与日本殖民政府抗争，以及与独立后单一化的国家教育政策对抗，并付出无数华人移民的性命、自由和血汗奉献之后所取得的成果。沈慕羽的故事，正是当代马来西亚中文教育的一个典范与代表²⁸。

1933年，21岁的沈慕羽在培风学校担任教职，从而开始步上杏坛，也积极投入政治活动。1947年，沈慕羽接掌马六甲平民学校，费了一番心血，在废墟中重建平民学校。在沈慕羽的悉心经营下，校誉日隆，并成为马六甲首屈一指的名校，家长皆以能够进入平民学校为荣。1955年5月7日，在沈慕羽的筹划下，成立了马六甲马青团，这是马华第一个青年团，并带动了其他地区马华青年团的成立。沈慕羽也因此而被称为“马青之父”，积极奔走争取华人的公民权。

1950年12月，沈慕羽就会见林连玉²⁹，力陈团结全国华校教师的重要，并倡议组织全国华校教师总会。1951年初，英殖民政府公布《巴恩教育报告书》，建议以官方语文（英、巫）为媒介的国民学校取代华、印文学校，华人社团纷纷表示反对。于是面对这股逆流，1951年12月25日正式成立了华校教师总会，也就是教总，从此掀起了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华教运动，奠定了华文学校今天继续存在的基础。教总的创立宗旨，是本着各族公民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及接受母语教育是基本人权的信念，争取华、印文与英、巫文并列为官方语文，主张各族母语母文教育一律平等，要求华文教育被承认为国家教育之一环，为民族语文与教育的生存与发展展开奋斗。

马来西亚政府透过一连串的教育法律修正，希望以巫语为国语，并成为单一

²⁸ 主要参考教总〈“服务一生，战斗一世”，永远的沈慕羽！〉，网络资料：<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97731>，2009年2月6日。

²⁹ 林连玉（1901年8月19日—1985年12月18日）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工作者、教育家，出生于中国福建永春，原名林采居。他自1935年起在吉隆坡尊孔学校（后来改为尊孔独中）任教，一直到1961年8月被马来西亚政府驱逐离校为止，期间致力于维护华文教育，主张民族、语言平等，积极争取把华文列为马来西亚官方语文之一，并推动了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和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的成立。他的精神后来也激励马来西亚华人争取公民权，华人尊称为“族魂”。此外，也有人称他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之父”和“华教第一斗士”。

化的教育系统，在几经抗议下，并没有强制施行。1950年代中期，政府也曾鼓励华文中学接受政府津贴金，改制成英文中学，确实吸引了一批华文中学改制。到了1960年代，《1961年教育法令》通过，要求一律设置为国民中小学，否则不予津贴。结果有54间华文中学在威迫利诱下接受改制，只有15间站稳立场，宁可放弃津贴金，成为“华文独立中学”（简称独中）。在严峻的考验下，董教总始终站稳维护民族教育的立场，坚持“津贴金可以被剥夺，华文中学不能不办”，开始在侨界发动募捐与抗争，希望维系中文教育的一线生机。当时的教总主席林连玉因而被褫夺了公民权和教师注册证，理由是：“故意歪曲教育政策，煽动各民族间的恶感和仇视。”

在马来西亚的中文教育陷入风雨飘摇的时刻，沈慕羽1965年起担任教总主席，他在推动教育工作之余，同样关注华人的公民权益，1966年，沈慕羽要求政府将华文列为官方语文，结果遭马华公会开除党籍。但他依旧积极努力奔走，更具体争取华人教育的独立与自主。1967年，教育部长佐哈里（Mohd. Khir Johari）宣布从1968年开始，只有持政府承认文凭的中学生，才准出国深造，意图断绝华文独中学生出国深造之路，于是沈慕羽开始进一步努力申办独立大学（简称独大），希望能够对抗政府的不合理政策。

政府对沈慕羽也不假辞色，1971年2月，为了华人社会的团结，沈慕羽不计前嫌，接受马华总会长陈修信的邀请，参与全国华人团结大会，在马来西亚怡保的一次8000人聚会发表演说。遭警方控以涉嫌触犯煽动法令，遭到逮捕，隔日保释出狱，打了两年官司才得以平反。

1987年10月28日，沈慕羽虽已75岁高龄，但却因为反对政府调派不谙华文教师到华小担任高职，而在内安法令下遭政府扣留，直到1988年6月3日，被关了200多天，才获有条件获释。他出狱后回忆道，当时的牢房即窄小又没有窗口，只有一个很小的天窗，食物是狱卒从中小洞丢进来，这段生活简直度日如年。由于食用带泥浆的山水，有胃病的他，常常半夜痛得起身吃药，虽然狱方提供医药检查，但医生给的药对他没效。此外，狱方还拿走他的眼镜，以致他的视力大受影响，而且还连一枝笔也不提供，因此，他每天大声高唱爱国名将岳飞的《满江红》以泄心头之恨³⁰。

自教总成立以来，沈慕羽即是理事会的成员，并于1965年12月被选为主席，一直连任到1994年5月，以82岁高龄为由不再接受挽留，才卸下教总主席的重担。在担任教总主席的28年期间，华文教育正处于风雨如晦，举步维艰的困难时期。

³⁰郑东阳，〈华文教育的“苦行僧”沈慕羽〉，《凤凰周刊》（2009）。

虽然如此，为了争取华文教育平等的地位，沈慕羽总是站在第一线上，身先士卒，带领教师与家长勇猛前进。这期间的经历包括了争取华语华文为官方语文运动、发起创办独立大学运动、推动独中发展运动，以及捍卫华小不变质运动等。他沈潜低调，处事中庸，在思想的研究上，或许不及钱穆；在文学的造诣上，或许不及林语堂，但就在异邦经营中文教育的扎根、坚持与战斗，则似乎又是两位文史大家远远所不及。何启良就指出：“如果不是因为时代形式和视野的限制，沈慕羽很可能是一位马华文化史上自成一家的大师，像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张元济，或蔡元培，甚至胡适之。³¹”我们或许不必用思想大师的标准来要求沈慕羽，但是中文教育的发展上，沈慕羽绝对是一个性格鲜明的文化人。

五、结语

在中国崛起的时刻，世界各地争相学习华语，使得海外的“华语文教育”风起云涌，对照钱穆、林语堂与沈慕羽饱受打压的时代，看似不可同日而语。实则三位教育前行者所坚持者，无论是书院教育、人文主义、东西文化交流或是保留文化传统，是典范在夙昔的中文教育，其内涵、精神与意义，应当不是以工具或功利导向的课程，所能望其项背。

本文回顾三个故事，特别有时代意义。海外华人社会中的青年，已经如黄锦树所说：“中文在那样的世界里，连标记自己的名字都是个难题。³²”无论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或泰国，新一代华人的文化认同转变之大，身份上均已背向父祖辈的故土，华语语境快速流失，国家机器让华文书写的日常根基彻底崩塌，也不过是三十到四十年的功夫。钱穆在英国殖民地上，建构书院，面对中国大陆当时弃传统于不顾，他尽一己心力，挽狂澜于既倒的用心，实在不应仅当作一则贫困中的传奇，更值得细心考察他对文学、人文与通识教育的重视。

在钱穆与林语堂的挫败中，更不难体察到，在殖民地与异国的政治文化下，华裔离散经验的凶险与混沌，意识型态国家机器总是会以各式的动员方式，将文化与思想单一化，中文作为一种特色与反抗的力量，除非有足够坚强的社会力量，有识之士能够团结，不停歇抗争，确实不易薪火相传。

讲述沈慕羽的故事，似乎是晦暗风雨中的一丝光芒。报载 1997 年，在他 84 岁寿宴上，他还站起来大吼道：“（马来西亚）从独立到现在，我们的华文教育都处在不安、不足、不满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利用公民权利，不断努力争取，非

³¹何启良，〈序〉，收录于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吉隆坡：教总，1997），页 55。

³²黄锦树，〈橙子与西红柿〉，收录于连明伟，《西红柿街游击战》（台北：印刻出版社，2015）

达公平合理不休。”这种源于基本权力保障的意识，长期抗争，团结教育界、商界与小区力道，使得马来西亚成为两岸三地外，华文教育体系保留最完整的国家。再次说明了，中文的薪火传承向来不是水到渠成的，而是必须透过知识分子与教育环境、政治文化与知识力量激烈辩难，投注自身的信仰、理念与坚持，方才能够点燃文学的火花。

【征引文献】

一、 中文著作

李业霖主编，《南洋大学走过的历史道路》，马来西亚：南洋大学校友会出版，2002。

连明伟，《西红柿街游击战》，台北：印刻，2015。

周爱灵著、罗美娴译，《花果飘零——冷战时期殖民地的新亚书院》，香港：商务印书馆，2010。

林太乙，《林语堂传》，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

唐君毅，《中国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台北：学生书局，1988。

钱穆，《新亚遗铎》，北京：三联书店，2004。

钱穆，《文化与教育》，《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1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

雷震，《雷震日记》，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89。

廖文辉编著，《沈慕羽事迹系年》，吉隆坡：教总，1997。

二、 期刊论文

王德威，〈历史，记忆，与大学之道：四则薪传者的故事〉，《台大中文学报》，第26期(2007)，页27。

王王颖，〈论书院精神的现代传承——兼谈新亚书院的办学启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4卷，第五期(2007)，页215。

陈国球，〈文学教育与文学经典的传递——国现代文学在香港初中课程的承纳初析〉，《现代中文文学学报》，6卷2期&7卷1期(2005/06/01)，2005年，页104。

陈以爱，〈钱穆论人文主义教育的失落与重建〉，《国史馆馆刊》，第45期，2015年，页192-193。

钱穆，〈新亚精神〉，《新亚校刊》第四期，1954年2月25日。

三、 研讨会论文

黄锦树, 〈制作华文, 想象华人: 马来西亚独中华文中学初中华文课本三种版本分析〉, 收录于《2009 年亚太地区语言与文化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0 年 6 月), 屏东: 国立屏东教育大学。

四、 报章、杂志

王德威, 〈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 《联合报》(E7 版), 2006 年 7 月 8-9 日。

刘再复, 〈新亚校歌: 珍重珍重〉, 《明报》, 1997 年 7 月 2 日。

张错, 〈文学奖的争议与执行: 世界华文文学领域探讨与展望〉, 《文讯》222 期, 2004 年 4 月, 页 4。

郑东阳, 〈华文教育的“苦行僧”沈慕羽〉, 《凤凰周刊》, 2009。

五、 网路资料

太史公孙, 〈南洋大学历史钩沉: 关闭南洋大学究竟是谁的主意?〉,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2013 年 4 月 30 日。

(<http://www.nandazhan.com/lishi/shuiguan.htm>)

刘桂标, 〈新亚精神的意义和价值——为纪念新亚书院创校五十周年而作〉, “香港人文哲学学会网页”, 1999 年 10 月。(<http://www.arts.cuhk.edu.hk/~hkshp>)

陈怡苹, 〈林语堂与南洋大学〉, “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2008 年 11 月 7 日。(<http://www.nandazhan.com/lishi/yutang06.htm>)

林语堂, 〈共匪怎样毁了南洋大学〉, 2009 年 6 月 28 日。

(<http://tw.aboluowang.com/2009/0628/135429.html>)

教总, 〈“服务一生, 战斗一世”, 永远的沈慕羽!〉, 2009 年 2 月 6 日。

(<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97731>)

六、 英文文献

Shih, Shu-mei. “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 *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volume 119, Issue 1 (January, 2004), p.29.